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三辑）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国际经济政策

[美] 古柏逊 (William Smith Culbertson) 著 潘源来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三辑）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国际经济政策

〔美〕古柏逊（William Smith Culbertson）著 潘源来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经济政策/ (美) 古柏逊 (Culbertson, W.S.) 著; 潘源来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71-5

I. ①国… II. ①古…②潘… III. ①国际贸易政策 IV. ①F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650号

国际经济政策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33.62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71-5/F.358

定价: 148.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原序

此書係討論國際關係上大部份的經濟因素。謂國際間敵視和衝突完全由於經濟的爭論固屬偏見，但謂該種事實如市場原料供給，放款及讓與所引起之競爭不是外交爭執及國際輿會上之主要原因亦屬同樣錯誤。此處並未曾將政治及經濟界限完全分別清楚。實際上政治因素亦包括有經濟因素。可是昔日外交時常想避免其太注重個人及政治特點而忽視國際商業及財政爭執為不屑討論之過失。個人和藹及禮節固常有其地位，不過我們很可以說外交之成功全在其握御經濟事實及經濟趨勢之政治重要性。在實際世界政治執行上，南滿鐵路公司與日本政府，英波石油公司與英國政府，戰前德國阿那托力安鐵路公司（German Anatolian Railway）與德國政府間很少分別的，最有政治頭腦的外交家亦必承認。我們甚至可以說決定外交官吏之行動和絞盡他們腦汁的大部份爭論事件都是經濟的，或者附於經濟的。

自導言一章以後，此書即討論影響各國直接商業關係及談判之各種原因。計包括關稅商訂之方法及原則與商約之根本，但專門一點的，重要點，如所謂「內國」及「最惠國」待遇等。此範圍內的各種問題之討論——牽涉國家責任及可能的國際複雜問題——遂自然的使我們遇到大英帝國內各邦間各種特惠條約。

其後五章多半涉及為競取特權及統治經濟落後地方所引起之各種爭執。是以對殖民商業政策加以分析，

而特惠，排他，獨占等政策則與門戶開放或商業平等原則相比較。關於國際競取原料，動力富源及資本出口之特權等則視爲一需要確定國家政策，而在若干方面則視爲一需要國際合作之問題而加以討論。最後一章則討論因國外貿易，海上交通所引起之國內及國際問題。

本書之目的是在指明各國及那指導國外利益的人們應當如何的計劃方法以控制那影響國運之經濟利益。全部討論總括起來有三個意見：（一）今日西方各國所流行的政治及社會統治觀念，若不是亞里士多得的，至少還是十八世紀的。（二）西方文化物質進步太快，且現今仍在進步。生存於新的物質世界內，我們缺乏一種能控制其破壞趨勢或改變其成功到社會目的上之統治的科學。（三）世界社會是全賴國家，保全國家則在乎成立國際合作之原則及方法，然後能解決各國單獨或相互談判所不能解決的各種大問題。觀管我們經濟生活的事實，爲我們共同國際生存上指出一達到完全無缺和賢明組織之原則乃此書之目的。

政府官吏之繁冗生活，使我不能從事繼續研究工作。此書乃數年之結晶。以後可以明白，牠並未涉及國內關稅，可是就大體上看來，係我日常工作之附帶著作。有許多部份都是取材於我在佐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訓練學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之夜校講演，其他則係我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在麻省，威廉城之政治學會會議當主席時之演說詞。因（Annals）主筆欽格博士（Dr. Clyde L. King）之美意，我曾利用我著的（Raw Materials and Foodstuffs in the Commercial Policies of Nations）內許多材料，該書係由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學會出版。

書內所表示意見是我發表的，皆由我個人負責，而與我參與的美國關稅委員會無關。

許多朋友皆時常給我以書內曾經用到的各種建議，並助我最後修訂此書。我趁此機會感謝下列諸氏：
Benjamin B. Wallace, Herman G. A. Braner, Perry T. Hitchens, Walter Rogers, Carl W. Bahr,
Edwin Schoenrich, Edwin Sands, Lloyd W. Maxwell, George Byers, Miss Martha W. Williams,
Arthur Connors, George H. Parater, Philip G. Wright, Francis Walker, Stanley K. Hornbeck.

古柏遜

譯序

立國於今日之世界，殊不能漠視一切國際關係而今日大部份國際關係，多不免受經濟因素的影響；故對於國際的經濟因素，尤其各國所採用之各種經濟政策及因此產生之結果，實有特別注意之必要。

本書作者古柏遜氏係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本薛文尼亞洲。一九一一年得耶路大學博士，後在德國之齊卜奇及柏林大學作特殊研究。一九一五——一六年曾至南美各國考查商務及關稅情形。一九一七年威爾遜氏爲關稅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一年哈定重任之，任期十二年。一九二二年被推爲該會副委員長。一九二五年辭去各職後，出任羅馬尼亞公使及智利大使。氏之著作除本書外，尙有一九一九年出版之（Commercial Policy in War Time and After）及一九二四年出版之（Raw Materials and Foodstuffs in the Commercial Policies of Nations）等書。氏對於訂立商約之原則，各國之經濟政策，如殖民地之攫取，海外之投資，國內富源之保留等曾經詳細研究，本書對於各種理論與事實敘述極詳，篇末歸結世界和平，首在鏟除經濟衝突因素，尤爲語意深長。現今英美大學多採爲教本或參考書，爰亟譯出，以饗國內學界。

原書內及每章章首所引用之昔人名言或詩歌，譯者因其（一）無關要義，（二）譯文難臻並美，概行從略。書內地名及人名概依照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外國人名地名表譯出，以資一致。

本書之翻譯承周鯨生先生及時昭瀛先生的鼓勵，並於多處加以指正，附誌於此，以表謝忱。

書於本年一月間開始譯述，至十月方成；中因事繁，屢作屢輟，譯者自知才短，欲於短促時間內完成，每感不勝，紕繆之處在所難免，尙祈海內賢達指正。

潘源來 二二、一、二二、三〇

目次

第一章	近代世界之背景	一
第二章	商約——內國待遇	二〇
第三章	商約——最惠國待遇	四七
第四章	關稅商訂之原則及方法	八七六
第五章	大英帝國內之保護及特惠	一二
第六章	門戶關閉	一七〇
第七章	美國殖民之經驗	二〇一
第八章	門戶開放	二三一
第九章	原料及燃料	二六五
第十章	國外放款及投資	二九七
第十一章	國際商業上之競爭和合併	三四五
第十二章	影響船舶之商業政策	三七六

第十三章	近代世界之近況	四二三
附錄一	一九二二年關稅法第三一七節	四三六
附錄二	英帝國公共契約上之特惠	四三九
附錄三	外國公債票之發行	四四一
附錄四	從事商業之原則	四四二
附錄五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英美間關於西印度羣島貿易之爭執	四四五
附錄六	與德國訂立之商約	四五〇
附錄七	巴拿馬運河通過稅	四五六
附錄八	影響交通之商業政策	四六一
附錄九	會議——有彈性的方法——係按照美國先例者	四八〇

國際經濟政策

第一章 近代世界之背景

歐洲以外土地之征服

發現，開闢及移民之時代——自哥倫布航海以前，一直到美洲革命——實觀西方文化之復興及歐洲國家在世界舞臺優勢之樹立。但隨卻近代式國家的發達，國家間對於殖民地及經濟利益之競爭，逐漸利害。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及英國各自用其政治軍事力量，以促進其商業利益。他們不僅欲在各海洋得到口岸，並且想完全管理整個海岸。(一)在亞洲及非洲他們的征服不過是表面的。在這兩洲國境上他們雖然建設了商埠，但此外內地之生活，仍為太古式的而毫未變更。在幾個例外地方如爪哇 (Java)，其土著人民之生活，因與外界接觸，已經改變，雖則其改變非全部的。但是在此世紀內所占領的地方，後來竟成為他們侵入內地之根據地，從此成立近世之殖民帝國。

他方面在美洲，則歐洲人民於該洲溫帶得到全未被人占據的最大土地，他們於是將其文化移植到新的環